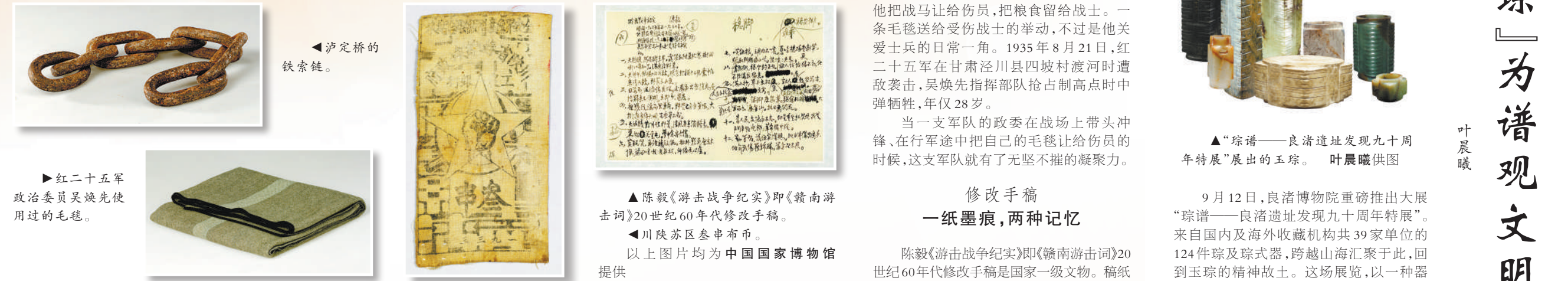


长征文物，照见胜利之源

黄黎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中，几件革命文物静静陈列。90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远征，硝烟早已散尽，而这几件烽火岁月留存下来的寻常旧物，从不同维度拼接起长征的壮阔图景。

铁索链
十三根铁索，通向新生

这是一段泸定桥的铁索链，1959年入藏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十三根铁索，一端是绝境，一端是新生。铁索的冰冷与战士的热血在那一刻融为一体——当一支部队敢于在没有桥面的铁索上发起冲锋时，它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天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畔。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崇山峻岭，只有泸定桥可以通过。此时桥上木板已被敌军拆除，仅剩十三根粗大的铁索高悬于咆哮的河面之上。对岸，敌军重兵把守，机枪火力点密布。

5月29日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奉命一昼夜夜行240余里，抵达泸定桥西岸。下午4时，总攻开始。22名红军战士组成突击队，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在火力掩护下，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手扶铁索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当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敌人引燃木板，桥头瞬间被大火包围。突击队员穿过熊熊火焰，最终夺取泸定桥。战斗中，4名英雄永远长眠于此。

叁串布币
母子一诺，十五寒暑

叁串布币记录的则是另一种长征——后方亲人的漫长守望。川陕苏区叁串布币，是川陕根据地物资匮乏背景下印制的布质流通货币，也被称作“红军票”。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向西转战，时任12岁的红军战士杨世才拒绝母亲劝归，将作为津贴的这枚布币留给母亲充作回乡路费，毅然奔赴长征征途。此后他历经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与家人长期音讯隔绝。母亲将布币细心珍藏十五载。1950

我家毗邻阳明祠

▲阳明祠。 谢亚鹏供图

10多年前，我搬到贵阳市东山路居住，家就在扶风山麓的阳明祠边上。这座承载着黔中文脉的古祠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几经迁改。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人们在扶风山另建新祠，到光绪年间又加以大规模修缮增拓，与旁边的尹道真祠、扶风寺一道，构成如今这组完整的古建筑群落。

刚住过来的时候，我常沿着祠外小路散步，看院内草木葱茏，回廊曲折，只把它当成家附近一处环境清幽的城市园林。2023年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其中就有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作为出版人，我们邀请南京师范大学郅波教授撰写《心学的诞生》，在参与书稿打磨的过程中，我慢慢读懂王阳明的人生际遇与思想脉络。自此以后我便常常走进这一墙之隔的古祠，院墙之内，一碑一石、一瓦一木，都沉淀着500年的黔中文脉，藏着先贤的精神风骨。

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贬谪贵州，在龙场悟道，创立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贵阳阳明祠集中留存了许多与王阳明相关的古代碑刻，是纪念和传承阳明文脉重要且保存完整的一处古迹。和不少后世新建纪念场所不同，这里的一块块石刻，都是代代保存下来的实物，默默记录着王阳明在贵州讲学传道的过往。

最初路过，只觉得庭院安安静静。等对阳明心学有了一定理解，再细细寻访，才发现祠里藏着不少珍贵文物。享堂是整座祠堂的核心，堂内的一尊雕像和一方画像碑尤其难得。享堂主间竖有王阳明谪居贵州的汉白玉雕像一尊，身着燕服，面容清瘦，凝神静坐，不见封侯显贵之气，唯有谪居士人内观自省的沉静；享堂内次间，是王阳明朝服大像碑，刻的是王阳明受封新建侯后的官服形象，气度庄重，尽显一代名臣的担当。

享堂墙壁上嵌有一通《追赠新建侯文碑》，古意厚重。碑文转录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的敕令，由清代贵州本地名家重新书丹上石，字迹端谨，是后世对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历史功绩的重要实物佐证。

庭院四周的碑廊，是古祠的精华所在，也是我最爱驻足细看的地方。上百方明清碑刻依次排开，历经岁月，笔墨神采依旧。

一块块带着风化痕迹的石碑，是可以触摸的历史；碑上的一行行文字，是可以接续的思想智慧。这些年，文物修缮、日常管护、文化宣讲工作持续开展，细致的保护，让古老建筑与碑刻得以安稳留存。这座老祠堂，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一砖一石都在默默滋养着城市的文化品格。

年代是理解考古与历史问题的根基。在众多年代学研究方法中，碳十四测年技术的精度最高，能够对距今约5.5万年以内含碳样品进行精确定年。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为构建史前年代框架与历史时序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也使学者得以摆脱单纯依赖地层学与类型学重建考古学文化史的局限，把更多精力投入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深度研究。考古学由此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碳十四测年技术由芝加哥大学的威拉德·

毛毯拿来盖在他身上。张波感动不已，一直珍藏着这条毛毯，直到1962年将其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娃娃军”，全军平均年龄不足18岁。长征途中，吴焕先身先士卒，独树镇战斗中带头冲入敌阵，挥舞大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行军路上，他把战马让给伤员，把粮食留给战士。一条毛毯送给受伤战士的举动，不过是他关爱士兵的日常一角。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洮川县四坡村渡河时遭敌袭击，吴焕先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时中弹牺牲，年仅28岁。

当一支军队的政委在战场上带头冲锋、在行军途中把自己的毛毯让给伤员的时候，这支军队就有了无坚不摧的凝聚力。

修改手稿
一纸墨痕，两种记忆

陈毅《游击战争纪实》即《赣南游击词》20世纪60年代修改手稿是国家一级文物。稿纸上毛笔字迹层叠，圈点、增删痕迹历历可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长征，项英、陈毅奉命率领部分武装留守南方，服从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转入粤赣山林开展三年游击战争，成为长征伟业重要的战略侧翼。

这12首《赣南游击词》采用《忆江南》词牌，跳出个人悲欢，忠实记录游击队伍的斗争实况：写粮食封锁下水煮野菜の窘迫，写山林露宿风雨侵衣の苦寒，写敌我周旋的游击战术，更写下军民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靠人民，支援永不忘”，在敌人推行“移民并村”、严密封锁的白色恐怖之下，当地百姓冒着杀身之祸，想方设法给深山里的游击队输送粮食、食盐。

90多年过去了。牺牲、信念、团结、依靠群众，这些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物件在时光中老去，精神却在凝视中重现。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明福寺塔。 张腾达供图

乡，心头最先浮现的，始终是那座静静矗立的大塔。

假期在家时，晚饭后一句“走啊，去大塔转一圈”，早已成为我和家人的习惯。塔旁夜市飘香，儿童游乐设施里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像极了当年我们玩闹的场景。塔下有个相亲角，老人们说，“明福”二字藏着善良与庇佑，大塔能为有情人牵线结缘。傍晚的塔下最是动人：广场舞的音乐轻快悠扬，大人牵着孩童漫步嬉闹，还有人围坐在一起下棋、打牌，欢声笑语萦绕在大塔周围。

而大塔，温柔地注视着一切，一如从前陪伴我的模样。

破译文物的“时间密码”

陈相龙

利比教授发明。1949年，利比教授成功对古埃及法老棺木、古赫梯王宫房屋地板等遗存进行了年代测定。这被视作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的标志，利比教授也因此荣获了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迅速推广产出了大量关键数据，重塑了欧洲史前史。

中国也紧随其后。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撰文系统介绍了碳十四测年技术，并于1959年引进核物理专家仇士华、蔡廷珍筹建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历经6年时间，中国首家碳十四测年实验室于1965年冬建成。此后，在仇士华等人的帮助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陆续建成碳十四测年实验室。

碳十四是怎么给文物“算年龄”的呢？碳元素有好几种“兄弟”，最常见的是碳十二和碳十三，物理性质稳定，不会随时间变化；而碳十四是个“急性子”，自带放射性，每隔5730年就要衰变掉一半。高空中的氮十四被宇宙射线中的热中子撞一下，就会“变身”为碳十四，然后迅速和氧气结合，形成含碳十四的二氧化

▲为保证测年样品不被污染，实验人员将装有样品的石英玻璃管接入真空系统，抽真空之后烧融玻璃管上段，完成密封。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供图

年代是理解考古与历史问题的根基。在众多年代学研究方法中，碳十四测年技术的精度最高，能够对距今约5.5万年以内含碳样品进行精确定年。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为构建史前年代框架与历史时序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也使学者得以摆脱单纯依赖地层学与类型学重建考古学文化史的局限，把更多精力投入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深度研究。考古学由此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碳十四测年技术由芝加哥大学的威拉德·



▲“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展出的玉琮。 叶晨曦供图

9月12日，良渚博物院重磅推出大展“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来自国内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的124件琮及琮式器，跨越山海汇聚于此，回到玉琮的精神故土。这场展览，以一种器物为线索，铺展开一部绵延5000余年的文明谱系，也为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献上一份厚重的文化答卷。

“古老礼器”从历史深处走来，成为当代文化符号和东方审美的延续，完成了古老文物的时代新生。玉琮“内圆外方”的独特造型，源源不断为当代设计提供文化灵感。从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的“上方下圆”结构，到融入亚运会奖牌、场馆建筑等的玉琮造型，5000年前的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城市独特的文化标识。而更多时候，它以亲切的面貌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冰箱贴、联名黄酒与青瓷茶具，甚至城市绿化和路灯柱上的琮形装饰，琮的艺术化表达随处可见。在良渚论坛等国际文明对话场域，玉琮充当着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不断厚植文化认同感。

玉琮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器物？这是所有故事的起点。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证实，这类器物为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此后，良渚遗址反山、瑶山等贵族墓地的发掘，系统揭示了玉琮在良渚社会礼制中的核心地位。学者普遍认为，玉琮是良渚先民首创的祭祀天地神灵的法器，也是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证。玉琮内圆外方，中孔贯通，器表雕琢着神秘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的通神礼器。器身转角处的那个头戴羽冠、驾驭猛兽的“神徽”，是整个良渚社会共同尊崇的神灵形象，是维系早期国家信仰体系的精神纽带。

随着良渚文明的衰落，玉琮开始了跨越千山万水的“旅行”。进入龙山时代，玉琮开始大范围の扩散和流变。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成为素面玉琮の兴盛之地。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所见的各类玉琮，是史前礼玉の余绪。战国至汉代的片状琮器物出现，则已是礼玉传统的最后回响。到了两宋，以琮为原型的琮式瓶进入文人案头，成为清供雅玩；明清时期，它又成为景德镇御窑の经典仿古陈设器。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将它的“旅行路径”系统呈现。

有意思的是，清代乾隆皇帝虽痴迷于收藏这些方筒形古玉，却始终不知其名，甚至误以为是车舆部件“扛头”，留下题诗10余首。直到晚清学者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以文献与实物互证，才最终为这件器物“找回了名字”。从礼器到文玩，从“名实分离”到近代正名，玉琮的形制不断更迭，功能持续演变，但“器以载道”的精神内核却始终延续。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1936年，年轻的施昕更在良渚镇一个干涸的池塘底部，发现了“黑色有光的陶片”。他或许不曾想到，这些陶片背后，埋藏着一座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史前都邑。9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发掘，反山、瑶山、莫角山、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逐一揭示，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而玉琮，正是串起这段探索历程的核心密钥。

一件器物，照见文明万千气象。5000年来，琮之演化与流播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恢弘气象。展览取名“琮谱”，意在梳理玉琮从诞生、鼎盛，到流转、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以4个叙事单元串联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琮类文物，还原器物背后文明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回顾学史，梳理琮谱，不只是回望一件玉器的前世今生，更是回望90年来良渚遗址从发现到传承的求索之路。展览并不止步于回溯过往，更致力于从文明源头汲取精神滋养，启迪今天与未来。

（作者单位：良渚博物院）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周飞亚 赵德汝

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碳十四测年技术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东亚地区作为人类起源研究的关键区域，在探究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对相关遗址人骨与动物骨骼样本开展的碳十四测年，为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的过程比预想的更为复杂，即使是早期现代人，也可能经历了两个或者更多波次的传播。

农业起源是人类从采集渔猎向农业生产转变的关键节点，这一过程涉及农作物的驯化、栽培技术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变革，准确的年代框架是理解这些复杂过程的基础。通过对考古出土水稻、粟、黍等炭化谷物及伴出遗存的碳十四测年，可以确定，距今1万年前长江下游与冀北山地已经出现了定居与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与之相伴的有稻米、粟与黍这些早期栽培作物。人骨碳十四测年显示，大约距今7800年至7500年，辽西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先民食物结构中，粟与黍这类农作物的比重已可达70%左右，这为论证早作农业社会初步确立提供了关键证据。

碳十四测年赋予了考古遗存精准的时间坐标，为考古研究进行了可量化的科学基因。随着测量精度的提升、样品需求量的减少以及校正方法的优化，其应用将愈发广泛深入。未来，碳十四将继续为破解人类历史未知谜团提供更多可靠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